

LINXIANGXIAO  
NAXIXUELUNJI

# 纳西学论集



林向肖

白庚胜 和自兴 和良辉◇主编

纳西学丛书

林向肖◇著

民族出版社

本丛书获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D234支持

##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 和良辉◇主编

和仕勇◇执行主编

林向肖◇著



林向肖

# 纳西学论集

LINXIANGXIAONAXIXUELUNJI

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向肖纳西学论集/林向肖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5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和自兴,和良辉主编)

ISBN 978-7-105-12792-4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纳西族—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K285.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7561 号

策划编辑:罗 焰

责任编辑:石朝慧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80 千字

印 张:6.5

定 价:32.00 元

ISBN 978-7-105-12792-4/K·2228(汉 1240)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  
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  
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愤然于这位权威之傲慢,同时也感慨纳  
西学学科建设之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  
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  
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  
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  
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  
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  
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

规模,刘半农、董作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人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做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时间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

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地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信将古麼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进而至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绝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里,纳西学已经产生《麼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麼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

果,产生了[法]巴克、[美]洛克、[德]雅纳特、[日]山田胜美、[日]君岛久子、[日]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日]伊藤清司、林向肖、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鋈、余嘉华、[日]諏访哲郎、和发源、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云峰、和品正、牛耕勤、木基元、木仕华、周智生、冯莉、孟彻理、[日]生明庆二、[日]斋滕达次郎、[日]村井幸信、[日]荒屋丰、[日]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由此我们也可以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深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出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存在的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成就突出者均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

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仕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李有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备感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寓所

## 五十而立之路\*（自序）

子曰：“三十而立”。惭愧得很。我的而立之年，不是三十，而是五十，整整晚二十年。

五十那年（1979）年初，我从丽江地委宣传部调任行署文教局主管文化的副局长，我就是因此而与纳西族东巴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开始了我的五十而立之路。

我原本在云南省公安厅工作，1970年“砸烂公检法”，从昆明下放到丽江地区农村生产队“插队”，“安家落户”当农民。两年后被“就地消化”于丽江。先后在地区写作报道组和地委宣传部工作，从未接触过东巴文化。当时仅知道东巴文化是纳西族东巴教的宗教文化，是“文化革命”对象；在十年动乱中，传承这种文化的东巴被当作“牛鬼蛇神”，东巴文化则成了“四旧”、“毒草”、“糟粕”。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把东巴文写成的东巴经，翻译成东巴文、国际音标记音、汉文对译、汉文意译四对照汉译本的丽江县文化馆工作人员也都受到冲击迫害；就连当时支持县文化馆翻译东巴经的县委书记，也成为一大罪状而被打倒在地。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已有两年的1979年，东巴文化仍还是一个令人心有余悸的禁区。当我开始抓文化以后，

---

\* 此文写于2004年1月，杭州。

才进一步了解：丽江是东巴文化的故乡，丽江县文化馆收藏有四五千册东巴经，比北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都多，居世界第一；而且早在 19 世纪，东巴文化即已走向世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自己既然主管文化，到底要不要抓东巴文化，敢不敢抓东巴文化，也就成了不能回避的当务之急了。

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使得我不能不亲自走进东巴文化世界去看个究竟，到底是不是“四旧”、“毒草”、“糟粕”。

东巴文化是以东巴文写成的东巴经为主要载体的纳西文化。东巴文是当今世界唯一活着的如图似画的纳西古文字。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东巴经，是除了东巴之外谁都读不懂的“天书”。幸亏丽江县文化馆在 60 年代初，根据东巴们的讲解，把 1000 多种东巴经中最有代表性的 22 种破译出来了，进行了四对照汉译，并且石印出来。我就是依靠这 22 种汉译东巴经，才能够走进东巴文化世界的。也许是与东巴文化特别有缘，很快就入了迷，也入了门，八九个月功夫就把这 22 种东巴经细读了一遍，并且可以得出结论：这种东巴教的经典，虽然包含有“消极的、有害的糟粕”，然而，它的主流却是不可多得的、极有价值的纳西族文化遗产，是“纳西族文学的丰富宝藏”，“集纳西族古文化之大成”，“是了解和认识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因为心里有了这个底，我才在 1979 年 11 月间，大着胆子在丽江县文化馆组织了一个东巴经工作小组，着手对馆藏东巴经进行清理、分类、编目。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就以此次读东巴经之所得，开始了自己的东巴文化研究，整理出《东巴经与纳西族古代文化》一文，《思想战线》1981 年第 3 期刊用了。也许因为是“文化革命”后重新评价东巴文化的最早一篇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少数民族》1982 年第 5 期作了全文转载，并且还先后被收录《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2 年出版）、《东巴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

版)、《民族古籍研究》(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三书。在1980年,我还为《简明宗教学辞典》撰写有关东巴教的词目,后收录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出版);写出东巴神话研究第一篇论文《神的世界和人的气息》(《玉龙山》1980年第3期刊出)。我的东巴文化研究之路就是这样起步的。

曾经因为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而蒙冤二十多年的纳西族老干部和万宝同志,在1980年初得到彻底平反,落实政策,担任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后,由他创议,经过行署批准,以丽江县文化馆东巴经工作小组为基础,在1980年6月成立丽江东巴经翻译整理委员会。他与我素不相识,大概是因为在此之前我就主动抓东巴文化,建立东巴经工作小组的缘故,竟也成为东巴经翻译整理委员会唯一的非纳西族委员,并由此开始与万宝同志有了工作关系。1981年5月,中共云南省委根据方国瑜(纳西族著名学者)与和万宝的创议,批准建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并决定由和万宝兼主任,方国瑜为顾问。万宝同志就要我负责抓筹建,后又由行署正式任命兼研究室副主任。东巴文化研究室的建立,不仅是东巴文化走出厄运走进社会科学研究神圣殿堂的转折点,也成为我的五十而立之路的加油站。研究室初建时困难重重,一无人,二无房,三无钱,甚至没有固定经费来源,连人头费都没有,全靠到处“化缘”,真是把自己的五十而立之路与研究室命运融为一体了。

在东巴文化研究室建立前不久,地区成立文联,我已经兼副主席主持工作,研究室建立后更是一身而三任,头绪更多,工作也更忙,只能尽量见缝插针研究东巴文化了。好在当时精力还比较旺盛,年年都能有点成果。1983年,参加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东巴文、东巴经形成时代的探讨》被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收录《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一书（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并吸收为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员。1984 年，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首次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对纳西族创世神话本来面目的探讨——〈创世纪·开天辟地〉校注札记》，也被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收录《神话新探》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并同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神话学会会员，进一步走进学术研究领域。

现在回过头来看，1979 年走进东巴文化世界，原本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职责所系，想不到却因此圆了十六七岁时所做的梦。那时，我在杭州高级中学读高二、高三，受到同窗好友影响，做起了文学梦、戏剧梦：两年时间先后有 30 多篇散文、随笔、影评、剧评等刊登在上海、杭州的《申报》、《前线日报》、《东南日报》等十来家报纸副刊，1947 年暑假还以同等学历考取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即今中央戏剧学院，因家里反对未能去读）。当时，杭州高级中学学生运动热火朝天，我一直是积极分子，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害后不久就参加了 YF（新民主青年社），1948 年又从国民党蒋介石管区到了大别山解放区，一心一意做革命的螺丝钉，再也没有做文学梦和戏剧梦了。想不到三十多年之后，一个偶然机遇，走进了东巴文化世界，而包孕于东巴文化之中的神奇东巴神话，竟又使自己走进了文学世界。只不过不再写散文、随笔……而是研究东巴神话的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关系、神话与宗教的关系、东巴神话的本来面貌、东巴神话的产生时代等等。其中有一篇《从纳西族神话产生的时代说起——对〈纳西族文学史（初稿）〉的一点商讨》，还被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印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一书。或许是巧合，也就在此时，由丽江地委宣传部和地区文联牵头，经过地委同意，成立了纳西族文学史研究委员会，由万宝同志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力争以

纳西本民族同志与丽江当地工作同志为主，编写一部新的纳西族文学史。经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协商，由双方合作，共同主持编写工作，我既做组织工作，又参与具体编写，是十三位编写成员之一。此书虽几经反复，到1992年才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此时我已离休五年，毕竟尽了自己力之所及，也不感遗憾了。

在1982年，东巴文化研究室在卷帙浩瀚的东巴经典中，发现了东巴文写成的《东巴舞谱》，不仅引起了舞蹈界关注，也成为东巴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热点。这个发现对我的触动很大，居然使我异想天开，萌发了创作东巴舞剧的想法：以东巴舞蹈来演绎东巴经典中的三颗明珠之一的英雄史诗《黑白争战》。我的这个想法，万宝同志非常支持，时任云南省文化局副局长的大别山战友李坚同志也非常支持，云南省舞蹈协会的刘金吾（副主席）、孙强（秘书长）两位同志不仅非常支持，还欣然同意担任舞剧顾问。这就使我下定决心，集中丽江地区歌舞团和丽江、宁蒗两县文工队的力量，用了一年多时间反复探索实践，终于把五场纳西族舞剧《黑白争战》搬上了舞台，参加了云南省首届民族舞蹈会演，获得了舞剧综合三等奖。《文艺报》1984年第6期《无声的倾诉》，对此剧的评论是：根据纳西族东巴经中记载的一个古老神话改编的这个舞剧，“歌颂了兄弟民族追求理想、不怕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著名舞蹈家、全国舞蹈协会主席吴晓邦说：‘我喜欢把这个剧叫做造太阳的人，它表现的思想比我们汉族的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更深刻。舞剧虽然是神话，但我们四化建设中就需要这种改造自然、创造新世界的人，这也是时代感’”。十七岁时做的戏剧梦，到五十四岁时才得以一圆，也算得是一曲小小的人生喜剧吧。

1987年，东巴文化研究室所有研究人员，参加了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的职称评定。根据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经过云南

省社会科学研究高级学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议，认为“具有担任副研究员职务任职资格”，成为东巴文化研究室最早被评为副研究员的两人之一。在1979年开始走进东巴文化研究领域之前，我对东巴文化一无所知，也不认识一个东巴文，九年工夫能有此结果，也可以看作是五十而立之路上留下的一个脚印吧。

也就是在1987年底，丽江地委出于对我那八十有六、远在杭州老家的老母亲遇到特殊困难的照顾，同意我提前离休易地安置回杭州。这就使得我这个“漂泊”他乡四十年的游子，终于能在慈母最后有生之年报答三春晖。然而，我并没有因此从东巴文化世界走出来，东巴文化永久的魅力早已完全征服了自己，使得我继续一心一意地走开始于东巴文化故乡的五十而立之路。

从1987年底到2003年底，“告老还乡”回到杭州整整十六年，一直为东巴文化而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而且始终念念不忘曾经工作、生活了十八年的已经成为自己第二故乡的丽江，每隔几年都要重返东巴文化的故乡，继续沉醉于东巴文化，进一步感悟东巴文化。

第一次是1989年，为参加东巴文化研究室召开的“纳西族原始宗教及社会思想学术研讨会”而重返丽江。我提前十多天赴会，过昆明时去看万宝同志，他当时是云南省人大常委，仍兼东巴文化研究室主任，竟和我同乘夜班长途客车提前到丽江，同住于研究室，同吃一锅饭。他一面抓研讨会准备，一面自己准备在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东巴教这种原始宗教的“宗教活动就是文化活动，其功能算是承担了今日教科文卫机构的全部职能”说。我则对东巴文化研究中颇有争议的，被东巴教奉为祖师的丁巴什罗的时代作进一步考证，完成了《丁巴什罗时代考——东巴经札记》论文（会后收录《纳西族原始宗教及社会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此期间，使我十分难忘的是，万宝同志每天早晨亲自打酥油茶，邀我同饮，边饮边议有关东巴文化种种问

题，而且仍同过去一样要我主持大会讨论。在五十而立之路上，有这样一位领导、良师、益友，真是莫大幸运。

第二次是1994年，应邀参加“20世纪纳西族文学创作研讨会”而重返丽江。这次也是提前去丽江，过昆明时去见了万宝同志，只是他已重病在身，却仍然一如既往地东巴文化研究室而操心，没有想到此次一见竟成永诀。此次重返丽江也在东巴文化研究室住了十多天，着重于研究东巴文学与纳西文学的关系，在研讨会上作了大会发言：“20世纪是纳西族历史上新旧交替、复杂多变的转折时期，也是纳西族文学发展史上传统文学与新文学的分水岭”；“纳西族新文学崛起的过程，既是一个从传统文学脱胎而出的过程，又是一个青出于蓝而又胜于蓝的过程”；“从20世纪走向21世纪，历史把纳西族新文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要同整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接轨”。发言后应《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之约，整理成文，刊载于1995年第1期。

第三次在1998年，是因为英国《独立报》刊登《最后的东巴正处于消失的危险中》一文，预言“东巴文化即将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之后，与老伴一起重返丽江，在东巴文化研究所住了将近一月，与研究所老同事、老东巴朝夕相处，共同探讨，寻找东巴文化到底会不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的答案。在此次丽江之行中，既回顾了东巴文化走向世界的经过，看到了东巴文化传承中的危机，也看到了从危机中走出来的希望，终于得出结论可以推倒《独立报》的预言。《东巴文化走向世界之路》和《东巴文化是否即将在这个地球上消失？——对东巴文化前途的探索》二文，也就是这样在1999年里完成的。前文刊载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后文先摘要收录’99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会议《论文提要集》，后又全文刊载于《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

第四次是2003年9月，应邀参加文化部批准召开的中国丽

江第二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会议，提交论文两篇：《“东巴教本是喇嘛教的一支”辨》、《对东巴文创始时代的再探讨》，会前即收录《论文提要》集。这次回返丽江，有一点意外收获，这就是会议期间所举办的“东巴文化百年成就展”，逐一介绍了“东巴文化百多位学人和传承者”，我也被名列于“国外学者和国内研究东巴文化汉族等民族学人”；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此次艺术节总策划、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则称我是“文革后切实领导纳西文化起步的干部和学者”；特别没有想到的是，成立于四年前首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期间的国际纳西学学会，我当时并未与会，却也被选为常务理事。对于包括离休十六年在内的二十五年来自己所走过的五十而立之路，能得到如此评价，也就心满意足了。

回首叶落归根、离休回到杭州的这十六年，聊以自慰的也就是能够年年都有所收获，先后有29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刊载于《民族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云南出版工作》、《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或者收录《东巴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防风神话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防风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以及1999年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和2003年中国丽江第二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学术会议论文提要集》。

除此以外，还在1990年为杭州大学出版社的鸦片战争150周年教育活动参考资料《屈辱与奋进》一书，担任责任编辑；1994年，为杭州老年大学建校10周年，编了反映十年办学成果的《学有所得 学为结合》纪念集（在此前几年曾先后在杭州老年大学及萧山、拱墅、杭州师范学院、一军干休所的老年大学分校讲过课）；在1999年和2000年，母校杭州高级中学100周年校庆前后，得到当年很多同学支持，与几位老同学合作，为杭

州高级中学老同学中的两位优秀学子：杭州临解放前夕殉难的金甲武烈士，杭州高级中学中共地下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大别山战友包文俊（钟锐）编印了两本纪念集。

《人民日报》2003年9月17日有一篇报道：2003年8月30日，“在波兰格但斯克闭幕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我国申报的纳西族东巴古籍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三项“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对于以东巴古籍为主体的东巴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的评价，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这既使自己感到庆幸，没有错过1979年那个难得的机遇，能够终生与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东巴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同时也使自己受到鞭策，一定要以2004年作为新的起点，更加努力地在有生之年，尽可能为它多出一份力，多做一点工作。

七十多年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概括起来就是七个字：也有风雨也有晴。前五十年，不能说没有机遇，只不过是多有风雨未能抓住，一直到五十岁才最后把握住了，做到了五十而立。尽管比三十而立晚二十年，毕竟还不算太晚，亦知足矣！